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文物中的古文明》評介

牛鵬濤 王澤文 劉風華

在當下“中國人文研究再出發”的整體背景下，如何從百餘年來中國學術的發展狀況中展望未來的路徑與方法，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由於理論和材料等方面的關係，中國古史研究所面臨的發展前景最引人矚目。20世紀80年代以來，李學勤先生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倡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應以歷史學、考古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注重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中國古代文明”是李學勤先生長期所致力的諸多研究領域中一以貫之的主題，他相繼出版的多部著作如《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也都以“文明”為題。

《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是作者自2003年秋正式調回母校清華大學工作至2006年末幾年間的論著彙集，是作者學術上豐厚積累和辛勤耕耘的碩果。內容側重近年來新發現、新公佈的考古遺存與文字資料的探索研究，另有部分內容是根據新材料對過往相關研究的再認識和推進。全書以考古學研究進展為基礎，在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創獲，是作者多年所倡以多學科交叉與綜合為特點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範式的典型體現。該書在結構上共分為七輯，涵蓋了作者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諸領域：第一輯古史研究，第二輯甲骨學研究，第三輯青銅器研究，第四輯戰國文字研究，第五輯簡帛學研究，第六輯年代學研究，第七輯學術史研究。

《文物中的古文明》的主要內容、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對古代文明研究領域中重要理論和方法問題的前瞻性探索。

《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第一輯“古史研究”和第七輯“學術史研究”，集中展現了作者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重要理論與方法問題的探索。這兩輯的內容不僅在全書中具有明顯的理論特色，而且對當下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領域深具指導意義。

(1) 重要原則。書中多篇文章從學科發展的高度，闡述了相關學科的建立過程和發展特點，指出應當堅持考古學與歷史學相結合，古文字學與古文獻學相結合，經學研究的文獻學角度與思想史角度相結合，歷史學創新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文科發展中多學科間交叉融會等幾個重要原則。

例如，《考古與古文獻的整理》論述了考古學對古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的影響和推動，指出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相互配合正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讀〈周禮正義·天官〉筆記》指出解讀金文及其他古文字中的職官制度時，應遵循孫詒讓《正義》中所揭示的古代職官“彼此關聯，名稱互相通轉”的原則。《古文字與古文明：21世紀初的認識和展望》闡述了古文字在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研究中所處的關鍵地位。《談經學與文獻學的關係》提出“經學”至少自孔子及其弟子對六經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和傳習論述時就已肇始，過去認為“經學時代”始自漢代的觀念應予糾正，除了思想史的方法之外，對經學的研究還應注重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研究角度。《國學與經學的幾個問題》闡述了對國學應持的態度和方法，對先秦及漢代經學如何把握等問題，強調要重視對漢末至唐代經學的研究，重新認識清代學術的複雜性。《理論與歷史學的創新》從郭沫若、侯外廬、蘇秉琦等人的學術個案出發，總結了學術創新的根本性、實踐性和對個人勇氣的要求。《深入探討遠古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探討了古史傳說與文獻、考古之間的關係問題。《交叉學科與文科的發展》、《歷史學、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結合和互補》提出多學科的交叉綜合是開創學科發展新局面的必要條件。

(2) 重要課題。《有關古史的十個新發現》、《考古最新發現與先秦史研究》、《虞夏商周研究的十個課題》、《最新考古發現對古代研究的影響》、《中國古文字學的最新進展》、《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等文章是作者高屋建瓴指出的學科發展前沿和最具價值的研究課題。

具體包括：作者通過對陶寺“觀象授時”遺址、涇北商城、花東甲骨、大辛莊甲骨、周公廟甲骨、周公廟西周遺址、眉縣楊家村青銅器、遂公盃、郭店和上博楚簡、里耶秦簡等十項新發現遺址與資料的分析，討論了新發現與古代歷史研究間的關係，重申了“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意義。另外，作者還列舉了考古遺址與唐虞探索，夏代歷史文化探討的區域擴大，商代甲骨文的分期與歷史地理研究，西周王畿內外諸侯的形勢，西周的年代學，西周的經濟制度，楚國歷史和文化，春秋戰國學術思想史的重新考量等八個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課題。作者提出的中原地區與邊遠地區的歷史作用問題，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等課題也富有理論意義。

在《古文字與古文明：21世紀初的認識和展望》一文的“關於青銅器分期的十個課題”部分和第三輯《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一文中，作者還指出青銅器的演變

具有多綫性,分期與分域結合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譜系,並提出了中國青銅器的產生,青銅器銘文的早期形態,商末青銅器,周初的“月相”,西周共和以下青銅器,秦楚青銅器的演變,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銅器,長江下游青銅器的序列,巴蜀青銅器文字的解讀,漢初青銅器的特點等十個對青銅器分期研究具有較大推動作用的研究課題。

(3) 學術史總結。《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在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探索上,還包含有對學科發展史進行回顧和思考的文章,如《侯外廬先生與明清之際學術思想研究》、《容庚先生對青銅器研究之重大貢獻》、《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的背景與影響》、《王國維的“闕疑”精神》、《深入探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就與經驗》、《追憶馬承源先生給我的幫助》、《學術的綜合和創新——紀念陳夢家先生》等。這組文章通過對思想史、古文字學、古史研究等學科發展歷程的回顧,特別是對學科發展史中重要人物的學術特點進行分析,為學科今後的發展作了寶貴的理論和方法總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 堅持“二重證據法”和考古學基本方法,對甲骨學和青銅器、金文進行探索,得出許多新知。

(1) 《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的第二輯“甲骨學研究”部分,包含了作者在甲骨學方面的十五篇成果。作者注重運用考古學基本方法對同為考古遺物的古文字材料進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主要創獲包括:《關於花園莊東地卜辭的所謂“丁”的一點看法》探討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中所見的一個指代商王的常見字,過去學界一般釋為“丁”字,與卜辭中不見生人稱日名的條例相矛盾,作者指出該字字形為一圓圈,是“璧”字的象形初文,讀為“辟”,是對王的稱謂。《再論家譜刻辭》指出“子某”有自己的譜系,與商王室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卜辭“子某”的“子”恐都不宜作兒子解,並進一步提出應結合新發現的材料,重新審視過去著錄的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從兩條〈花東〉卜辭看殷禮》根據《花東》480、363 兩條武丁時期的卜辭,與《殷契萃編》中年代在康丁前後的 1000 胛骨卜辭,以及年代為商末的陝西長安大原村始尊銘文,指出它們雖彼此年代相隔甚遠,但在“圭一、珥九”或“戈一、珥九”的用禮制度上幾乎完全相同,這充分表明“殷禮”在前後演變的同時也具有一貫性和制度性,明確了從禮制角度出發研究甲骨,探討當時歷史文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裸玉與商末親族制度》探討了殷墟劉家莊南所出“玉璋”朱書文字,證明至少在商末親族制度已經相當規範和複雜,後世宗法制度於此已有其雛形。《論新出現的一片征夷方卜辭》探討了新出現的一片黃組征夷方卜辭,與《合集》、《合補》相關卜辭合觀,可知夷方被商朝征伐的原因是侵擾了商的東國,也即東土,由此,夷方居於商朝的東方得到了終極的證明。《一版新綴卜辭與商王世系》

指出《史記·殷本紀》的商王世系比過去理解的更為可信，該版新綴卜辭為歷組卜辭的時代再次提供了有力證據。《論清華所藏的一版歷組歲祭卜辭》指出該版卜辭反映的是在“周祭”之前的一種不太規則的特殊歲祭，祭祀的隆重程度偏於近世先王，可與文獻相印證。《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指出幾項新材料是西周存在《周易》經文，周朝與諸侯國在文化上關係密切的明證。這些文章不僅對甲骨卜辭進行了文字釋讀，更從歷史和制度的層面做了重要推進，堪稱同類研究中的典範。

(2)《文物中的古文明》第三輯“青銅器研究”、第四輯“戰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年代學研究”的多篇文章，都屬於青銅器與金文領域的研究成果。書中對金文的考釋，是與對傳世文獻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緊密結合的，同時，作者認為金文的研究只是青銅器研究的一個部分，所以對沒有銘文的青銅器也同樣給予重視。作者主張通過對青銅器五個方面(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和工藝)的深入研究，把其中所蘊藏的文化內涵充分闡發出來(《從眉縣楊家村窖藏談青銅器研究的五個方面》)。主要創獲有：通過對各器物及其銘文的研究，探討了殷周制度變遷，商末歷史地理，西周王朝與諸侯國間的關係，西周社會經濟狀況，祭祀典禮及祭祀觀念，世族，學制，青銅器分期等許多重要問題。

例如，《論士山盤——西周王朝干預諸侯政事一例》探討了西周王朝對諸侯國的事務擁有較大的干預能力，有助於深入理解西周時期王朝和諸侯國之間的關係。關於金文和文獻中的“士”，還可參看作者近年所撰《文盪與周宣王中興》一文(《文博》2008年第2期，收入《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李學勤卷》)。《禹鼎與張家坡井叔墓地》將青銅器及其銘文進行繫聯，提倡根據新出銅器銘文推進西周世族研究。《季姬方尊研究》討論了銘文所反映的西周社會經濟狀況。《作冊般銅龜考釋》涉及商末的歷史地理問題。《僕麻卣論說》、《商末金文中的職官“攜”》由銘文中的“僕”和“攜”入手，討論了殷周職官制度的發展演變。《伯嶽青銅器與西周典祀》討論了西周的祭祀典禮以及周人的祭祀觀念。《試論新出現的版方鼎和榮仲方鼎》則討論了銘文中的“序”與西周的學制。關於“序”字，作者後來在《論榮仲方鼎有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又有補證(收入《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李學勤卷》)，可以參看。《西漢金文中的咸陽》討論了秦都咸陽與西漢雲中郡咸陽縣的區別。《關於鹿邑太清宮大墓墓主的推測》探討了宋國的早期歷史。《談西周厲王時器伯戣父簋》根據人物和史事的繫聯，確定了一批厲王時與南征有關的青銅器。

在《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十個課題》中，作者提出在分期的方法論上應強調把考古學的類型學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學等去論證和深化，考慮青銅器的多綫演變，分期與分域相結合，排出各個區域不同時期的譜系。體現這一研究方法的，可舉出

《齊侯壺的年代與史事》一文對傳世青銅器洹子孟姜壺時代的認定。作者在《北京東北旺出土叔繁簋研究》、《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等文中進一步指出,判斷青銅器的時代應把考古學的層位學、類型學方法放在首位,當該方面與銘文釋讀發生矛盾時,應先對後者進行核檢。《莊白瘠器的再考察》結合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等所出新材料,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青銅器分期斷代和金文曆譜研究的新進展,對西周中期後段到晚期前段的有銘青銅器進行了深入分析。該文是對作者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所作《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尺規》的進一步推進和完善。

作者對戰國文字的研究,同樣注重與歷史、考古研究的有機結合。如《滎陽上官皿與安邑下官鐘》、《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計算》對戰國量器的校量問題的研究,《釋東周器名卣及有關文字》對銅器銘文中“卣”、“鋨”、“枳”的釋讀,及其與文獻中“卣”字關係的討論,與經籍所載禮制的印證等,都是這一特色的體現。

第六輯“年代學研究”部分,是作者繼《夏商周年代學札記》(1999 年)之後在三代年代學方面工作成果的集中體現,反映了作者結合重要新發現和新進展在該領域持續深入的探索。如《眉縣楊家村器銘曆日的難題》針對眉縣楊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佐鼎曆日的不能調和現象,結合金文材料中的“十四月”記載,討論了西周晚期曆法的粗疏和調整。《談寢斲方鼎的所謂“惟王廿祀”》關涉商末諸王年祀。《晉侯蘇鐘的年代學問題》由金文人物事項的繫聯論證晉侯蘇鐘歸於厲王世的合理性。《談伯呂父盃的曆日》、《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論親簋的年代》、《補論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頌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論匭伯再簋的曆日》等文也都是對西周金文曆譜的檢驗和進一步完善。

李學勤先生多年前即提出“比較考古學”,目的在於強調比較研究在考古學中的重要性(見氏著《比較考古學》)。《談大型連弧紋彩繪鏡》討論西漢文化藝術傳播的廣泛性和普遍性,《蒙古新發掘匈奴墓所出漢鏡》、《重論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漢鏡》論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就是作者在這方面工作的繼續。

文物是具有重大學術意義和藝術價值、不能再生的財富,祖國文物由於種種原因不幸流散是極令人痛惜的。對這些文物辛勤訪求並進行介紹和研究,是彌補這一缺憾的可行方法。作者多年前曾將有關論作彙集為《四海尋珍》,《文物中的古文明》書中也有相當篇幅關注於此。

由於時代的久遠和材料的局限,對於中國古代文明這一極具廣度和深度的大課題的探索,研究結果必然會隨不斷涌現的新材料、新方法以及新理論而有所前進。科學研究是無止境的,這就要求科學工作者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文物中的古文明》書中《“秦子”新釋》、《〈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前言》等文對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

國早期大墓墓主的身位的反復討論,《中山石刻釋文》對中山石刻的改釋,《十二字越王州句劍讀釋》對劍銘文字的新讀等,都體現出作者在學術問題上勇於進取、不斷反思、堅持求真的可貴精神。

(三) 通過簡帛佚籍與傳世文獻的對照,致力於重寫學術史。

作者多年來一直倡導深入研究學術史,強調將考古學的成果與學術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對學術史上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再認識,進而重寫學術史。《文物中的古文明》第五輯“簡帛學研究”就是作者在這一領域最新成果的體現。這一輯中的十九篇成果,內容涉及對上海博物館楚簡、郭店楚簡、馬王堆帛書、包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等多批出土簡帛佚籍和文書的研究。

該部分的主要創獲有:《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子羔〉等三篇並非一卷》討論了楚簡的文字釋讀和簡序編聯,並分析了全篇的主旨內容和文本性質。《論先秦道家的“夜行”》、《楚簡〈恒先〉首章釋義》、《釋古代道家的“宇宙”》一組文章討論了道家“夜行”、“恒先”、“宇宙”等重要概念,並與相關文獻予以比較研究。《論戰國簡的卦畫》、《由楚簡〈周易〉看馬王堆帛書〈周易〉經文》、《出土文物與〈周易〉研究》、《〈周易〉與中國文化》一組文章討論了馬王堆帛書《周易》、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上博楚簡《周易》、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等四批與《周易》密切相關的材料,指出長期以來人們所謂的“數字卦”、“筮數”實際上都是“卦畫”,對帛書《易傳》的珍貴價值予以肯定。《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探討了儒家孔孟之間、道家老莊之間學術思想的演變。《〈尚書·金縢〉與楚簡禱辭》指出《金縢》與楚簡在禱祝上的類似性,及其所反映的古代禮制的承續性。《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則對目前所見有紀年可考的楚簡及其所出墓葬的年代作了系統全面的討論,可作為戰國楚簡和楚墓年代尺規的定點。

整體來看,《文物中的古文明》一書體現了多學科結合、多材料互證、多角度探索等研究特點,是作者在學術上多年耕耘所獲成績的代表。該書不僅在探索一些具體的學術問題上取得了許多新知,更通過這些研究案例,展現了作者在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領域中的宏觀把握能力和理論思維水平,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都極具典範性,相信對相關學術研究的影響是廣泛和長久的。

(牛鵬濤 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王澤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風華 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